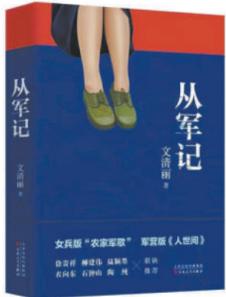


现实质感与动人细节

——关于长篇小说《从军记》的笔谈

★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陶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军事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批农家出身的军队青年作家，近距离描摹自我从乡土走向军营的坎坷历程。由于所写的大都是自己或者身边人所经历的故事，因此极具现实质感，迅疾打动读者。这类作品当年被命名为“农家军歌”现象。

日月如梭，30年过去了，近几年创作热情高涨、作品成果丰硕的军旅作家文清丽，又推出一部长篇小说《从军记》。主人公李晓音30余年的军旅生涯，坚实地支撑起女兵版的“农家军歌”，唤醒读者沉睡多年的记忆，为这个题材注入新的生机。

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呈线性结构，以主人公李晓音既普通又不平凡的成长经历串联起一个家庭、几座军营、三代军人、一个时代。上世纪80年代，西北黄土高坡上正在读职高的农家少女李晓音自觉考大学无望，因有两个已经在部队当上团职干部的哥哥，便萌发了当女兵出去闯世界的愿望。但是她入伍的过程并不顺利，在二哥李晓义那里碰壁后，又到大哥李晓忠家里撞运气。最终，一个偶然的契机，让她穿上了军装。

李晓音的视角之下，两位后来当上将军的哥哥及其小家庭的命运变迁、四位新闻系女同学的成长之路、新兵时最

亲密的女战友秦小昂的情感纠葛、大姑子林诗诗在李晓音成长过程中施加的种种影响，都与部队发展变革的大背景交织在一起，使这部小说成为多声部的合唱，丰沛而灵动。随着阅历的增长，李晓音终于理解了大哥，卸去了郁积在心的对大哥的怨怼——她这才发现，大哥当初不帮她，并非不帮她，而是让她走自己的路。大哥用自己的言传身教，诠释了当代职业军人应有的操守。大哥实则也是她的“精神导师”。李晓音的成长，是时代的赐予，更是她本人不屈不挠的奋进使然。

法国作家法朗士说过：“一切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半自传式的小说。因为对生活的熟悉，因为有作者亲身经历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大量富有质感的、富有肌理的、原生态的细节运用，大量富有张力的心理描写和环境描述，使得文清丽笔下的故事和人物塑造真实可感。文风质朴、文笔扎实、娓娓道来，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点。

小说发展到今天，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之下，在网络新媒体的全方位覆盖渗透之下，如果文字内容晦涩难懂，怕是会遭到读者的抛弃。

《从军记》最为成功的地方，在于它能够打动人心。小说到底是干什么的？无论如何，有一条需要明确：“小说是用来打动人的！”如果小说不能打动人心，作品的功能和价值也就无从谈起。《从军记》中就有不少深切动人、让人泪目的地方。李晓音初次离家，已经结婚、无法再远行的姐姐希望妹妹有个好前程，叮嘱她到了二哥家，在嫂子面前要讲卫生，不要让城里人反感。李晓音考上军校后，舍不得甩掉与她“情投意合”、却仍然是士兵的全涛。学校放寒假，她顶风冒雪去他的部队看望他，并且突然把他带到父母面前，想逼家人就范，但遭到一致反对。她内心的纠结，相信不少因为身份转变、不得不同恋爱对象分手的人，都有过那种极为复杂的内心体验。

一个农民家庭出了两个将军，省里的记者前来村里采访。记者们到李晓音家门口时，李晓音70多岁的母亲正在炭渣里拣还能烧的炭。记者问李母：

“你怎么把他们培养成共和国将军的？”此间的对话和描写，感人泪目。小说的动人之处还有很多。凡有过军旅经历的读者，一定会引起强烈共鸣；没有过从军经历的人读它，正好是一次“新鲜的旅程”。

《从军记》是一部军人的成长史，也是一部心灵史。作品成功塑造了当代军人的鲜活形象，勾勒出动人的军中儿女图谱。时代的肌理与质地，军中生活的火热景象与动人感触，以及砥砺初心的奋进足迹和人民军队新气象，都被诚恳地呈现给读者。

谭国伦：一部长篇小说的成功不外乎主要人物个性鲜明、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环境铺垫妥帖恰当等。然而，再好的故事情节，再优美的语言描绘，再典型的人物形象，如果没有了细节的刻画，作品的生命也是黯淡的。因为，文学作品生命的光泽正是闪耀在细节之处。

如何刻画细节，取决于作家对什么东西着迷，也显示作家的审美趣味。

小说《从军记》所营造的时代环境和人物关系，构造了李晓音军旅生涯时展开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结成各种关系，也产生了各种情感连接。情感的动人之处，就在于细节与真实。那些细微的温暖往往能生出磅礴能量。《从军记》中描写的兄妹情、母子情、战友情，无不是在点滴生活细节之处催人泪下。

真正的细节藏在生活之中。文清丽在其写作中不断地回望自己的来路，持续书写黄土高原的人文与自然风物。《从军记》对于西北面食与秦腔的细致书写，也为作品增添了浓郁的生活质感。比如，描写单位集体转业之际舍不得脱下军装的李晓义与李晓音通电话时，满口家乡话吼出的秦腔《满江红》，“儿纵马杀敌十年整……”，突兀却又生动地表达了西北汉子对军旅的不舍和丰沛感情。

小说对于景浩这个人物的塑造指向某种理想化，她集人民子弟兵优良作风品质于一身。入伍之初，李晓音观察到景浩是三位班长中唯一没有改军装的。部队历来不准私改军装。没有宏大壮丽场景与事迹的书写，此处仅用部

队生活中的细节就将景浩严格遵守部队纪律和作风过硬的气质展现出来。

景浩以其自身训练成绩获得了担任李晓音这批女兵班长的资格。她对全班战士都满怀关爱，对后进战士李晓音爱得更多。正如秦小昂的表述：“睡觉给你盖被子，吃饭给你夹菜……她每次看你，眼神都是热的。我还发现，她虽然嘴上在批评你，可语气能听出来是疼爱你的。那眼神像什么呢？对，就像我吃饭时，我妈看我的眼神。”对话内容将一个关爱新兵的女兵班长形象刻画出来。它借由第三者讲述，展现景浩的行为和形象，这种细节呈现的方式也使得行文结构流畅自然。

革命军人的坚守与选择，是军旅文学中感人至深的篇章。《从军记》的故事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此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逐步兴盛。作者用“窥一斑见全豹”的手法，通过对秦小昂、全涛言行的细描，精准地揭示出时代变迁背景之下社会存在的多元观点，展现了市场经济勃兴背景下人们多元的思想动态与选择。相较之下，李晓音及其兄长等人的追求与坚守，也就更凸显其可贵。

在《从军记》中，小说通过细节搭建出足够真实生动的环境，由此将读者的全部心思吸引入文学虚构的世界；使得读者喜悦于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在动人的故事和场景中收获审美愉悦。这就是《从军记》细节描写传递给读者的阅读体验。

小说《从军记》中更多细节与精思，需要在阅读中体会。作家依靠对细节的关注，有力彰显了人物个性，渲染出时代氛围，为情节推动埋有伏笔。文清丽在处理小说中的细节时，始终以平实的语言叙写，没有大开大合的铺陈，而是在韵味隽永的细描中低语诉说、娓娓道来。

袁枚说：“须知米豆千颗，不若明珠一粒也。刀枪杂弄，不若老僧之寸铁杀人也。”精致优美的细节之于文学作品，也是如此。阅读《从军记》是一场独特的旅行，顺着时间的脉络，在场景的转换中，那些军人积极进取的故事，洋溢着生命热情的细节描写，带给人以美好和感动。

★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维吾尔族诗人狄力木拉提·泰来提之所以要为诗集《一百零一片红叶》(光明日报出版社2021年12月)取这样一个名字，意在以凌霄傲雪、灿烂如霞的红叶为意象，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敬。诗人近年来奔走在新疆大地，面对正在发生着巨变的故乡，写下了一首首激情洋溢的诗歌。阅读着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的诗集，让人思绪飞扬地走进历史风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阿尔泰山野的迅风，浩瀚大漠传来的悠远驼铃，沿着叶尔羌河，穿越戈壁沙漠，行走在龟兹、库车、克孜尔千佛洞……然而，就当你沉浸在历史遗韵中时，耳畔又传来了风驰电掣的高铁轰鸣，乌鲁木齐美丽家园熙来攘往的喧哗声……将一个勃发着新时代脉搏的生活景象的新疆，交相辉映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的诗歌深沉、隽永、抒情而又不乏幽默，洋溢着对山川草木等天地万物的无限爱意。全书精选了101首诗歌，其中大部分以新疆的壮美山川、草原为背景，描绘了新疆大地上发生的沧桑巨变。

悠久独特的历史，雄浑壮阔的山川，塑造了美丽迷人的新疆。而置身于正在发生的深刻历史变化，狄力木拉提·泰来提心中不可抑止地充盈着强烈的创作激情。他心潮澎湃地行走在新疆各地，深入观察感受着故乡发生的历史变化，对沉淀于心底的民族历史记忆与鲜活的现实社会生活，进行诗性的思考，最终找到了寄托自己内心情感的诗意象征——映红天际的枫叶形象。我想只有内心广博、胸怀辽阔的诗人，才会将历史与现实，以引人思绪绵绵的101片红叶，蕴含着岁月脉络，呈现着赤色诗情，奉献给读者。

在狄力木拉提·泰来提心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百年峥嵘岁月，就是一首跌宕起伏、气吞山河的中华交响诗。蕴藉丰厚的新疆历史与人文，被他化为了奔涌跳动的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水滴。以敬点透视的折射，映照着新疆的山川、草原、村寨、人群……由此串联起一条映照历史岁月，闪现着民族背影，呈现着民族性格，浓缩着历史景象的诗意“项链”，让人从中窥见坚韧、质朴、丰富的新疆历史与人文图景。诗集以滴水成溪的汇集，让人们走进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内心深处，最终凝聚为56个民族共同的精神风貌。

由于多年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缘故，我与狄力木拉提·泰来提一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他出生在新疆伊犁，后随父母到哈密生活工作。调到新疆文联后，他在主编期刊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翻译、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在此期间，他被推荐到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作家班学习；回到新疆后，又被选派到南疆驻村工作了三年。丰富的人生阅历，执著的文学坚守，使他始终以敏锐的文学洞察力观察着飞速变化的社会生活。时至今日，他已翻译出版了几十部文学译著和两部诗集，其译著、诗歌都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

由于他具有维、汉两种语言文化的深厚修养，使他游刃有余地捕捉着当代新疆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生活信息，并以多维文化的咀嚼、剖析、思考，最终呈现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

这本诗集作品，让人们看到了他对新疆历史、自然、地理、民族、性格、生命

诗意的时间与空间

尹汉胤

等多个层面细腻的描述，客观冷静的文字表达。面对新疆飞速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各种文学思潮的来袭，他没有盲从跟风写作，而是始终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着新疆的人文历史。他的作品将飞速变化中的社会现象，冷静地置于时间、空间、瞬间的维度中加以比较、品味、悟道后，才以充满激情、饱含哲理的诗句娓娓道来。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笔下那具有信仰力量的中国红，是诗人从心底唱出的赞歌。历史、现实与瞬间的情感体验，在优美的诗句中完美融合。

作为维吾尔族诗人的狄力木拉提·泰来提，在其诗中讲述的祖先对赖以生存的山川地域、自然环境，所表现出的生命感悟、定力、性格，是镌刻在这个民族基因中的印记。正是这种心灵感应，造就了他在文学创作中对地域、自然、时空和瞬间具有与生俱来的敏感。

高大的植物并非一定是生命的强者，而草原上随风而动的牧草，其韧性的生命，使其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这种诗句，不仅呈现着生命的定力，更朴素地道出了一种历史生存观：企图超越历史发展规律的突进，滞后时代进程的麻木不仁，都将会遭到历史的惩罚。

文学创作的根基始终在生活中。狄力木拉提·泰来提从地域生活中审视历史，从万物生灵中提炼哲理的诗性思维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社会、思考生命、发掘文学的思路，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内涵。

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绝非空洞的概念。它鸣响着中华民族慷慨激昂的历史回声，流淌在中华民族人民的血脉中。

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定力，是由这个国家民族精神奠定的。通过时间、空间、瞬间筑就的中华民族历史基石，让我们更加坚定自信地看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从文化与历史根底出发

房伟

★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索崇高

很早我就有了写作《石头城》(《十月·长篇小说》2022年第3期)这部长篇小说的念头。2008年，我读博期间在南京大学历史学者张宪文教授指导下，写过名为《屠刀下的花季——南京1937》的纪实文学作品，讲述南京陷落期间少年儿童的故事。那时，有不少讲述南京陷落故事的影视与文学作品问世；张宪文教授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尚在陆续出版中，我有幸提前看到了相当多的史料。写完那本纪实作品，我当时就有了写个类似题材小说的念头。我要为苦难的先辈们写作，我要写中国人的故事。

新世纪以来，起于张纯如对拉贝、魏特琳等外籍人士的史料发掘，南京抗战再次受到世人关注。“南京陷落”是中国近代史上惨痛、屈辱的重大事件。这些年相关的“南京叙事”，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在那场几十万中国人死难的“大故事”里，“主角”不是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人，而是来自西方的“拯救者”。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拉贝与魏特琳等西方人士的历史功绩。他们在中国人面临苦难时站出来，拯救无辜，救助扶伤，值得尊重。然而，今天面对那段惨痛的经历和记忆，我们需要更多本土作家从本民族文化与历史根底出发，写出自己的“中国故事”。我们的主人公应该是那些面对历史浩劫的普通中国人。

后来，我博士毕业，忙于科研与教学任务，写南京抗战小说的想法也就暂时搁置了。2016年，我调到苏州大学任教，这里距离南京很近，我的写作欲望再次被激发出来。这些年，

我从一个文科教授变成了中年“文学新人”。我比较偏爱历史题材，陆续写了几十篇抗战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其中数篇涉及南京，也为《石头城》打下了基础。

小说创作的难度很大。从资料层面来讲，经过学者们不懈努力，这方面史料已非常丰富，新史料也在更新我们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很多认识。比如前些年发掘出来的“红山义勇”资料，关于“南京抵抗者”的故事。但我需要更多历史细节。从抗战前后南京的民俗民风、历史风貌、地理环境，再到当时混乱复杂的历史场景与特殊氛围，各色人物的表现，都值得去关注。为了写作这部作品，我在清凉门大街租了房子，当了大半年的南京人。我在南京图书馆查阅大量报纸，寻找那时的历史氛围。我在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办了借阅证，搜罗各种资料。我买来1937年南京地图，按图索骥，以“案件侧写”与“田野调查”方式，模拟当年日军入侵和军民的混乱撤退；在中山门、挹江门等各个城门，在南京那些大大小小的古迹和街道上，我时时处于巨大的“历史眩晕”，仿佛穿越历史尘埃，化身历史中人，亲身感受那时炮火的威胁。

创作过程中，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不仅在文物史料上寻找历史细节、感受历史的硝烟，更留意步入纪念馆中的中国人和外国人，观察他们面对巨大历史震撼时的表情。我仿佛置身于无数死去的和活着的的人的目光之中。他们鼓励着我，激励着我，顽强地写下去。那年深冬，一个雨天的下午，我独自去南京理工大学附近的西山阵地考察，荒山空无一人，只有几条上山的小道，泥泞不堪。那里有昔日的战壕和碉堡，我不

断拍照、沉思、体验。为了更好地感受氛围，我拨开两边的荒草，试图寻找更多细节。然而，荒草太高太深太密，我很快失去方向感迷路了。雨越下越大，天也越来越黑，荒草遮蔽了视线，我似乎感受到无数奇怪的声音，在呼唤着我。我的手被草割破了，大衣也湿漉漉的，雨伞也被狂风掀翻。

作为中国人、中国作家，我们书写这一题材时还面临着其他的困难。一方面，我们要摆脱西方叙事的影响，写出中国人的心灵创伤和心理体验，写出中国人的牺牲和抵抗，写出“以中国人为主体”的中国故事；另一方面，我们又写出历史的丰富与复杂，通过文学笔法，在历史的褶皱中寻找鲜活细节。我们绝不可游戏历史，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历史，又不能过于拘泥，让小说文本丧失应有的丰富性、可读性和故事性。

为此，我以爱国主义与民族文化为根本，以现代的历史理性关照历史事件，并结合中国传统国家战记记忆中的“兴亡感”，来展开我的“石头城”故事。我设计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家国情”，写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还有日本人、美国人等几十个人物，试图描写面对巨大历史灾难的慷慨悲歌，包括很多战争场面描写。另一条线索则以日常生活为主，有中目各类民俗文化的展示，也有中国人文化尊严的彰显。我力争将这两条线索融合，既有严肃的历史记忆，也有丰富可读的故事和鲜明立体的人物形象。

我写作过程中有大量工作都是在查阅资料，包括查阅学术著作、日记、报刊、文件等，寻找创作感觉。小说完工后，我大病一场，有数月痛苦不堪。我不知道读者如何看待这部小说，只能说尽了心力。我完成了十几年前的写作心愿。



长征

第5711期



向前(油画)

张株作